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 大后方历史（下）

◎主 编 周 勇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 大后方历史（下）

◎主 编 周 勇

南明中学的同学显得更为活跃,该校高中学生秦天真、丁树奇、饶博生、孙师武,初中学生徐健生、李策、孟昭仁、吴绍勋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以“国家前途怎么办?”、“我们青年学生怎么办?”为题,商讨抗日救国的办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更加广泛地发动起来。这些抗日运动的消息传到贵阳后,使贵阳的爱国学生更加振奋。他们从前一段抗日救亡活动的实践中,认为成立一个领导青年学生救亡工作的团体非常有必要。于是贵阳几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通过联络,于1931年冬成立贵州学生救国团。贵州学生救国团成立后,便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贵阳各大商店日货充斥。为抵制日货,1932年初,以秦天真、丁树奇、饶博生、顾建中、刘子溪、贺登发、何广键、蓝运臧、寇述彭等为首的“学生救国团”骨干力量,在贵阳掀起了“抵制日货”、“检查仇货”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除贵阳中学、贵阳一中、达德学校、贵阳女师的爱国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小学生。学生们在市中心中华路举行游行,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号召有日货的商店自动交出仇货。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市民的赞扬和支持,但却遭到部分奸商的抗拒和反对。“恒兴益”、“协成”两家商店,自恃与军警有勾结,不仅阻挠学生验查,而且毒打了进入店堂的爱国学生,激起了群众和全市学生的义愤。爱国学生冲入各大商号进行搜查,把货架下仇货摔出店铺,并封闭了大量贩卖和私藏日货较多的商店,奸商们被爱国学生的抗日行为吓得纷纷躲藏起来。事后,学生们还包围了省政府,要求当局惩治奸商,查办军警头子。省主席王家烈慑于爱国群众的抗日声势,被迫出面公开道歉,下令没收奸商资产,并撤职查办了宪兵营长。之后,省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通缉一些倾销日货、民愤极大的奸商。

1933年12月,省教育厅按国民党教育部颁发《中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中学应届毕业生除参加本校毕业考试外,还要举行毕业会考,企图以会考束缚学生,转移学生抗日救国的注意力,削弱抗日救亡力量。对此,进步学生又发动和组织了反会考斗争,揭露会考阴谋,迫使省主席王家烈宣布取消了会考。

除了抵制日货和反会考外,贵阳学生抗日救国团还经常利用星期日,组织宣传队在六座碑(今贵阳市民生路)搭台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主办了《救国旬刊》,由丁树奇任主编,该刊以宣传抗日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阴谋为主要内容,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口号。《救国旬刊》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抗日救国团的骨干还组织了读书会、讲读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

在贵阳光懿女子小学、达德学校的女教师和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也组织了“贵州妇女救国团”。她们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加学生救国团的各项活动,一方向还在当时的《新黔日报》上开辟《惊蛰》专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1934年5月4日,贵州妇女救国团与部分青年学生在贵阳联合召开五四运动纪念会,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行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省内其他地区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遵义各校学生宣布罢课,全市学生、工人、商人和市民共3000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独山爱国师生在九一八之后组织“夜呼队”、“夜哭队”,沿街道痛哭大呼。“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赤水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爱国青年学生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贵州军阀政府对之采取的态度是由起初的不合作、不阻挠发展到后来的阻挠、破坏。在贵阳,他们利用收买少数学生散布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爱国学生对这一卖国论调予以了严厉的批驳,指出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御敌于国门之外。教育厅长陈公亮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亲自召集学生开会,强制学生放弃抗日反蒋,少数被收买的学生还对爱国学生进行要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爱国学生气愤地痛打了陈公亮,并冲散了这次压制学生抗日救国的会议。

青年学生的这些爱国行动表明,大敌当前,无论反动当局如何压制人民的爱国意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仍会不断高涨。同时显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

即将在贵州全省掀起。

1934年1月,中共毕节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团结进步青年,在原“女子初中班”和“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抗日救亡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工作;一方面为进行抗日斗争,准备在滇黔交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打算在军阀犹禹九的部队中拖出一部分武装组建抗日武装。不久,毕节党支部成员转移贵阳后,继续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等团体,秘密学习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觉悟,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1934年,中共党员周守如(周济)从重庆脱险后转移到遵义,以办“女子职业社”作掩护,在知识界进行抗日和革命宣传。1933年至1934年中共党员曾慕琴、周维群(周司和)也相继从四川转移到遵义,在他们的宣传引导下,遵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以遵义三中、女中为基地,成立了遵义“学生自治研究会”,通过购进和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进步活动,激发了遵义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1934年,以遵义二中、女中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人士为基础,建立了“反日反帝大同盟遵义总部”,把遵义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受贵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安顺一些中小学教师及部分文艺爱好者也成立了“晓鸡声文艺社”的文艺团体,出版了《晓鸡声半月刊》,发表了《醉中》、《香麦面》等宣传革命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后来,党组织在安顺还组织了“三乙读书会”,创办了《安顺文艺半月刊》、《安顺三日刊》,安顺中学也创办了《安中校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成为安顺进步力量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市民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和支援,抗日浪潮席卷全国。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爱国学生提出了建立学生抗日救亡组织的要求。1936年5月29日,中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民族解放的大

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到底”。1937年元旦,全国学联创办的《学生报道》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登载了《全国学联工作报告》,指出了学联成立以来组织工作方面的不足,决定在全国各地筹组学联,并派代表到各地进行联络。不久,全国学联的代表即分赴各地。

1937年6月,全国学联派杨蕴清从北平到贵阳负责筹组学联工作,杨蕴清在贵阳的活动得到了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支持,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策主持,在贵阳第三小学和高家花园分别召集学生党员和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听取杨蕴清介绍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杨蕴清在会上号召全省学生联合起来,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团体。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杨蕴清关于筹组全省学联的意见。7月2日,经过筹组,召开了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委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贵州省立女子中学、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州省立贵阳中学、贵阳县立中学的代表,会议选举朱世芬为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省学联)主席,陶信镛负责组织,黄奇鑫负责宣传,王锡桢负责联络。会议还决定除贵阳县立中学外,其余5所学校均成立学联支部,分别由党员周树楹、黄奇鑫、聂奇慧、乐恭彦、王锡桢等人负责,各学联支部下设若干小组,以各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读书会员为骨干,利用各校学生自治会为学联的活动阵地,通过各学联小组去串联进步学生。

这时,在都匀、惠水、贵定、瓮安、凯里等地也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社团,通过张贴传单、演剧、歌咏、办刊物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除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外,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征战沿途刷写了许多标语,画了很多的漫画,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发布了各种文告等等。红军的广泛宣传及革命实践,对唤起贵州民众觉醒,宣传和团结动员各族人民起来抗争,积极加入抗日救国行列,推翻反动政权,进一步促进贵州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以及释

放政治犯等条件,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国局势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全国大形势所迫,国民党贵州当局在公开镇压中共组织、破坏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于是,贵州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进一步高涨的形势,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团体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蓬勃开展。

从1935年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成立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贵州地下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省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了配合红军长征的工作,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贵州地下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在开展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英勇的尝试,即使是在遭到严重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也不退缩,而是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加勇敢地战斗。贵州地下党组织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成长、发展,逐步地成熟了起来。

(二)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

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于1937年9月派黄大陆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由延安回贵州负责党的工作。

黄大陆,号振东,字孑生,1904年1月生于云南省文山县城关镇一个教师家庭。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工兵科十六期,1922年毕业后至1929年在滇军历任见习排长、少校参谋、旅参谋长,1930年部队在滇西下关被龙云击溃后,黄大陆辗转于滇桂黔,1931年11月到贵阳,广交社会名流。1932年,黄大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驻贵州)三师参谋长,1934年秋,经邓止戈介绍,黄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9月,二十五军一师师长何知重邀请黄大陆任该师少将参谋长,黄借机将邓止戈介绍到该师任参谋。1936年4月,

何知重师改编后调四川,黄大陆等被送到南京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37年,黄大陆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以“探亲”名义,经西安转到延安,与先期到此的邓止戈见面,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并受到朱德同志接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中央决定派他回贵州负责党的工作。

黄大陆回到贵阳与李策见面后,随即着手组建中共贵州省工委,并及时向贵阳地区的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人到毕节、织金、遵义等地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员的发展工作。

李策,又名李策良、李智卿。1915年旧历11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少年就读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曾任校长的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就读于贵阳高级中学初中部,1933年升入高中部后,即被推举参加全省学生救国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冬经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同孟昭仁等组成中共贵阳高中支部,领导学校党的工作。1935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工委遭到敌特破坏后,李策隐蔽在贵阳郊区从事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李策受组织指派,于1937年春秘密到达黔桂边的六寨,向转移至此的秦天真汇报工作,并接受了秦的指示,携带党的有关抗日方面的文件返回贵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李策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于1937年7月,组建了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社会各界抗日救亡活动在贵阳不断兴起。

为指导全省的工作,省工委印发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小组生活》等文件。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对什么是公开工作,什么是秘密工作,在若干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外,并重点强调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指出两者“是矛盾的,性质上是绝对的不同”,但又是“活的辩证法的”,认为“这两个方式不能配合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公开工作是革命的策源地的工作,秘密工作是革命的资源地的工作”。要求“在公开环境里,争取领导作用,供给秘密工作的情报和材料,受秘密工作支配……秘密工作要完全明了公开工作情形”,“秘密工作在‘里的面’帮助公开工作的开展,公开工作在‘表的面’帮助秘密工作的开展”。并严格规定:“负公开工作的同志,就不

应该负秘密工作的责任,负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必跑去争取公开。”^①

《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则是就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在时间、地点、说话、情报、态度、生活、通讯等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特别强调了一个革命者应遵守党的原则和纪律,要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人生观,“临难不苟免”、“至死不屈服”,经受住敌人各种物质的诱惑,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不能丧失气节,背叛组织。

《关于小组生活》着重阐述了党小组是什么样的组织,过好党小组生活对于党员自己的革命修养、理论的学习探究、处理问题的能力、指导革命活动等重要意义。

这三个文件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根据以前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敌特逮捕,全省停止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及党员的实际,为重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党员并避免被破坏,减少牺牲,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而制定出来的纪律原则和行为、工作准则,是从贵州当时党的建设、抗日救亡活动的实际情况和地下斗争的需要出发制定出来的,十分详细具体,便于操作,对今后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公开活动、秘密活动的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时的省工委组织机构尚不健全,为充实省工委的力量,更好地领导贵州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黄大陆化名李瑞卿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贵州的工作情况,报告说:“为着清理核查的便利,在九月下旬产生工委会”,并且特别说明:“为着慎重提拔干部,工委会只李策和我负责。”同时强调:“贵州工作,目前感到缺乏,就是干部,许多事的推动迟缓,主要是干部问题没有解决”。^②为推动贵州党的工作,他请求中央派人到贵州加强领导力量。1938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贵州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员发展工作取得的成效,为使党在贵州的活动有更大、更进一步的发展,遂派邓止戈、秦天真回贵州充实和加强省工委的领导力量,由邓止戈任省工委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邓、秦抵筑前,黄、李二人已于2月21日被敌特逮捕)。

^① 省工委文件《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1937年12月20日),《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2期(总第3期),第52页。

^② 李瑞卿(黄大陆):《贵州一般情况》(1937年11月10日),见《贵州历史档案》专辑(一),1983年7月,第10页。

对于贵州的工作,在邓止戈、秦天真离开延安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央进行了部署,指出:贵州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开展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抗日的形势是会影响贵州的。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有利条件下,应放手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公开的社会团体及合法的群众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贵州是国统区,与敌后情况不同,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游击活动。

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巩固清理、整顿党组织所取得的成果,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新的党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和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起来抗日,实现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并结合贵州1935年七一九事件以来,党的组织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和暂停党员发展工作的实际,一方面立即着手清理整顿、恢复发展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停止了直属军事小组的武装活动,将已掌握和建立的武装分散隐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抗战纲领、主张,发动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领导和推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

(三)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省工委组建之初,为全面开展党的活动,使各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迫切需要有充分的组织保证和充足的人员保证,于是,省工委把恢复和发展全省各地党组织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经过大量工作,很快恢复、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为进一步开展全省党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然而,这项工作的开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则是在此之前清理、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

为摸清情况,理顺关系,纯洁组织,1937年10月,黄大陆派徐健生以省工

委特派员身份到毕节地区清理整顿组织。徐健生到毕节后,很快便建立了清理委员会,徐健生任主任,邱在先、熊蕴竹、葛发声、邱在模为委员。该委员会把重点放在清理工作上,在毕节等县开展清理,主要措施是:(一)对该县原有的党员逐一进行清理登记;(二)对党员发展对象和在党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认真的审查。经过一个月的工作,于11月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1938年2月,建立了由邱在先、熊蕴竹、邱在模、葛发声4人组成的中共毕节县工委,邱在先任书记。县工委下辖4个支部。

1938年1月,黄大陆派由织金到贵阳工作的党员方献祥回织金清理关系,建立党的组织。根据黄大陆的指示,方献祥回织金后,以织金“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负责人身份为掩护,白天组织学生在织金县城及近郊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夜间则秘密进行党组织的清理工作,经过充分准备,他与谌志经、赵百川、黄典伍、张宗玉等人于1月27日建立了中共织金县工委,方献祥任书记,谌志经任组织部主任,张宗玉任妇女部主任。

与此同时,省工委通过丁树奇指派原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回遵义清理地下党组织,开展组织建设,不久原遵义县委委员谢树中经组织营救由四川巴县监狱出狱回到遵义,他们一起为恢复中共遵义县委及其活动作准备。

通过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加上对以前贵州党组织的工作的总结,为后来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及党员发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全省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地下斗争经验通过不断积累得到进一步丰富,党的组织有所发展,在贵阳、毕节、思南、安顺、遵义、湄潭、织金等县先后恢复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还直接领导了凯里、镇远、平越(今福泉市)等地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并在学校、书店、交通运输单位等建立了党支部。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0年4月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止,全省共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32个,其中县级以上组织14个。

1938年3月,省工委在对贵阳地区党员作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恢复了中共贵阳县委,由谢凡生、丁树奇、高言志、熊蕴竹组成,谢凡生任书记。县委恢复组建后,即按省工委的布置,把清理、整顿组织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对党员

进行了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5个党支部、2个党小组,至6月,清理、整顿工作结束,贵阳县委随之停止了活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贵阳党组织也得到不断发展,党员人数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文化、职工、青年、学校等方面的党组织发展较快,鉴于新的情况和工作的实际需要,省工委于1938年9月决定再次恢复组建中共贵阳县委,并在其之下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贵阳地区各党支部的工作。1939年2月,县委书记谢凡生因身份暴露而转移重庆,省工委遂调陶信镛任贵阳县委副书记。4月,为加强贵阳县委的领导,省工委从平越调吴绍勋任贵阳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吴绍勋又调往省工委在安南(今晴隆)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周辛农继任贵阳县委书记。同年12月,周辛农被调离贵阳县委,县委工作即由陶信镛负责。1940年2月,省工委为加强贵阳地区党的工作,决定由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兼任贵阳县委书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为减少损失,保存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贵阳地区党组织作紧急疏散,贵阳县委由此停止了活动。

1938年元月建立的中共织金县工委,下辖工人、市街、学生、农民、妇女5个党支部。县工委为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县工委负责人及各支部党员都分别寻找社会职业,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例如方献祥到城关第二男子小学任教,张宗玉到城关第一女子小学任教,等等。党员们以学校为阵地,积极组织歌咏组、话剧组,教唱抗日歌曲,公演《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等剧目,印发《抗日十大纲领》等文件,领导进步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县工委还加强对各个党支部的领导,通过组织“农会”、“职工会”,办农民识字班和妇女识字班,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0年4月以后,由于省工委进行了疏散转移,织金县工委与省工委失掉了联系,县工委也因为组织城区各学校部分小学教师向当局要求解决食米补贴问题,被国民党当局设计陷害,工委成员被迫疏散转移,但县工委仍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坚持开展隐蔽斗争。

1938年2月,中共毕节县工委建立后,除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培养入党对

象,发展党的组织外,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利用1937年6月开办的“群益书店”作为宣传阵地,购进和销售了大批进步书刊,如《列宁选集》、《鲁迅全集》、《论持久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华日报》等。书店由于得到了省工委和贵阳“生活书店”的支持,每次进货都优先购得很多畅销书,这些书不但在较为偏僻、闭塞的毕节畅销,书店还以发行教科书为名,将这些进步书籍、报纸推销到毕节地区各县和云南的镇雄、昭通、彝良等地,既扩大了销售渠道,增加了书店收益,更重要的是使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地处西南边陲,国民党势力控制较严密的贵州,特别是相对落后的毕节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第二,1938年秋,国民党第八补训团政治处驻毕节,县工委促其成立了“孩子剧团”,并利用该剧团到大定、黔西等地沿途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抗日节目,张贴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大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8年12月,“群益书店”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经常派特务到书店进行监视,检查书报。为防止敌人的进一步破坏,根据省工委指示,县工委书记邱在先转移大定,王芸生接任县工委书记,继续开展党的工作,组织“读书会”,开办学校,对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培养进步青年,使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1941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王芸生等县工委委员和邱在陵等党员及进步积极分子相继被捕,中共毕节县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停止了活动。

1938年4月,中共遵义县委在杨天源、谢树中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恢复,杨天源任县委书记,谢树中任副书记。县委首先同国民党遵义当局展开争夺青年知识分子的斗争,决定派谢树中、傅邦瑞打入国民党遵义县党部组织的“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团结爱国青年,加强我党对“青抗”的领导,把国民党控制的“青抗”争取、改造过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号召和发动,在进步教师潘名挥等的支持下,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加入到“青抗”的工作中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培养和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和党员,从1938年到1940年,中共遵义县委先后

发展了20名党员,壮大了组织力量。

中共遵义县委为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经过积极筹备、并得到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意,于1939年9月底开办了“快读书店”。书店开办之初,为了增加保护色,县委委托政界、文化教育界、商界的朋友出面牵头,联络各界知名人士集资入股筹办书店。书店经理是中共党员刘星洲,书店明里是销售中小学校教科书和科技书,暗中则在贵阳“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重庆的“读新书店”、“生活书店”及重庆新华日报的支持下,购进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周刊、《军事杂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艺战线》、《列宁选集》、《资本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报刊,采取后门进、后门出的销售办法在当地销售,购者甚众,销量可观,仅《新华日报》每天的发行量就超过当时遵义销售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倍。书店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惶恐不安,省党部主任黄宇人到遵义指责“快读书店”是共产党的基地,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来遵义时,也对该书店的开办向遵义当局提出了警告。国民党遵义县当局的警察、宪兵、特务于是经常以出版检查制度为由,开列“禁书”单,加紧对书店进行搜查,任意拿走书架上的红壳子书籍,对经理刘星洲进行跟踪监视,企图寻机逮捕。由于书店被邮检扣留的书报太多而无法继续营业,被迫转让他人,另租铺面以“合力文化教育用品社”的名义经销文具,代销《新华日报》,直到1941年完全停业。

1939年夏季前,省工委派陈光型、夏思明、李知群、李焯然等到遵义县工作。为充实县委力量,8月,省工委决定陈光型任中共遵义县委副书记。次年6月,陈光型调离,李知群接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940年秋,县委书记杨天源转移到乡下隐蔽,县委工作即由李知群和李焯然暂时主持。

1939年冬至1940年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贵州当局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省工委遂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省工委书记邓止戈转移途中离开桐梓时,派隐蔽在桐梓的地下党员赵促成去遵义,同隐蔽在遵义的地下党员陈光型、李焯然、唐贵等接上组织关系,李焯然以省工委名义组建了中共黔北特区委,李焯然任书记。中共黔北特区委的主要任务是联络遵义、桐梓、仁怀、湄潭、金沙、思南等地的党组

织,疏散隐蔽干部,筹集活动经费,转送《新华日报》等,负责领导黔北各县党组织开展活动。由于此时仍处在疏散隐蔽时期,黔北特区委的人员大都转移他地,陈光型根据省工委指示去思南,因此时思南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旋即返回遵义时留在湄潭;李绰然转移至老家湄潭隐蔽;赵促成则转移到仁怀。黔北特区委实际只有唐贵一人活动在遵义与贵阳之间。1941年3月,唐贵调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同年8月及次年3月,李绰然、赵促成相继被捕叛变,至此,中共黔北特区委活动终止,组织解体。

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日甚,继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于1941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遵义当局也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破坏,大肆跟踪逮捕中共党员,加之中共地下组织内部相继出现叛徒,造成中共遵义县委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受到限制,党员的安全也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转移敌人视线,杨天源在受到叛徒严密监视,并妄图通过对其监视而抓捕到更多中共党员的情况下,于1941年3月只身转移到湖南常德隐蔽,遵义县委再次停止活动。特别是曾主持过遵义县委工作,任过中共黔北特区委书记的李绰然于1941年8月被捕叛变,给中共遵义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危害。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于同年9月对全县中共党员进行大搜捕,逮捕了傅邦瑞、徐继芙等5名中共党员和傅邦荣、潘名挥等爱国青年。至1942年春,中共遵义县地下组织机构解体,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省工委还在黔北地区成立了中共桐梓城市工作支部和中共桐梓支部,批准在湄潭成立了中共永兴支部即中共湄潭支部,不久又建立了中共湄潭县总支。该总支下辖7个支部,即湄潭支部、城区支部、永兴支部、七七支部、德隆支部、协育支部、水文支部,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以及黔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早在1935年4月建立的中共安顺县工委,在谢速航的领导下,一直在安顺地区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根据安顺地区地下斗争的实际,县工委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烽火》杂志,先后发表了《发刊辞》、《加强我们的斗争》、《我们需要健全

的——救亡组织》、《全面抗战与贵州土匪》、《一·二八六周年》等针砭时弊、号召全民抗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政策的文章。这本杂志不仅发送给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阅读,还在书店里出售。由于刊物文章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具有较强的号召力、鼓动性,因而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读物。正因为这样,《烽火》成为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要求国民党贵州当局将之取缔并逮捕刊物主办者。至此,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烽火》被迫停刊。

由于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县工委从敌人内部获知当局准备以“勾结土匪”的罪名逮捕谢速航等人后,经省工委决定,1938年10月谢速航撤离安顺,转移外地,县工委工作移交给杨斌毅负责。1939年春,安顺的形势愈来愈不利于地下活动的开展,杨斌毅遂调离安顺,县工委由朱桂林负责。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经省工委批准,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由朱桂林、刘英泰、张恒兹3人组成,负责领导安顺、紫云、镇宁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成立后,旋即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并讨论决定了七条工作意见:1.大力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紫云师资训练班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2.做好社会失学失业青年的工作,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3.加强对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宣传,争取到各基层小学任教,推动阅读进步书刊,扩大对教师 and 学生的影响;4.到农村去动员群众,组合民间枪支,建立革命武装,作好抗日游击战的准备;5.注意吸收有武装的财主子女参加,只要求他们有抗日反蒋的思想,不过分强调家庭成分;6.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那些主张抗日和倾向革命的地方人士及政府职员,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情报耳目;7.利用地方派系矛盾,尽力争取那些受官府或封建豪强势力欺压的地方武装,为我所用,求得武装力量的发展。

根据上述意见,地下党全面开展工作,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号召,以紫云合作金库和师训班为据点,联络地方爱国人士及学校师生,在县城与部分乡、镇开展了抗日宣传,举办“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读物,促使一批青年迅速觉醒。同时还加紧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